

第9典

宗教与民俗

第10典

中外文化交流

第1典

历代文化沿革

中华文化通志

第2典

【地域文化】

第3典

民族文化

第4典

制度文化

第5典

教化与礼仪

第6典

学术

第7典

科学技术

第8典

艺术

巴蜀文化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袁庭栋 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2 典

【地域文化】

巴蜀

文化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巴蜀文化志

作者简介

袁庭栋,1940年生。1965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68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1983年参与筹建巴蜀书社,并在该社工作至今。著有《张献忠传论》、《殷墟卜辞研究——科技篇》、《巴蜀文化》等20余种。

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四川盆地古称巴蜀，产生于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称为巴蜀文化。本书叙述了从古代到近代巴蜀文化发展的盛衰轨迹、主要特点，以及对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叙述中力求全面而突出重点，严谨而不枯燥。

本书认为，巴蜀文化在古蜀文明时期、汉代与唐宋时期有过三次繁荣的高峰，三度位居全国的前列。宋代以后呈现全面的衰退，清代后期才有明显的复苏。早期的巴蜀文化是自有特色、独立发展的一种文化，但与外界（包括中原文化）一直有着日趋密切的交流，在交流之中发展、创造。从宏观的高度来总结，巴蜀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主要由移民文化而表现出来的兼容。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释“巴”、“蜀”	1
第二节 关于“巴蜀文化”.....	7
第三节 巴蜀文化的兴衰轨迹.....	9
第四节 巴蜀文化的基本特征	18
第二章 地理	23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文化发展	23
第二节 气候条件与文化发展	25
第三节 地形特点与文化发展	26
第四节 地理环境与行政区划	30
第三章 民族与人口	37
第一节 以巴族、蜀族为主的巴蜀先民.....	37
第二节 盆地内汉民族的形成	44
第三节 两千年的人口增减与文化兴衰	49
第四节 盆地周边的主要少数民族	58

第四章 科技	70
第一节 水利	70
第二节 冶金	83
第三节 钻井术与井盐开采	89
第四节 天然气与石油开采	98
第五节 造纸与印刷术	106
第六节 医药	116
第七节 历算	127
第八节 织锦	133
第五章 学术	140
第一节 教育	140
第二节 古代巴蜀学术管窥	148
第三节 特色显著的汉代学术	152
第四节 宋代蜀学	157
第五节 明清时期学术的衰落与复兴	167
第六章 艺文	179
第一节 尚待完全揭破的三星堆之谜	179
第二节 生生不息的民间歌舞	185
第三节 汉代文章冠天下	194
第四节 独绝一时的汉代造型艺术	202
第五节 唐宋诗人多入蜀	209
第六节 西蜀画派	221
第七节 源远流而又多源的川剧	228
第七章 宗教	241

第一节	古巴蜀的原始宗教	241
第二节	道教的产生与传播	243
第三节	道教圣地青城山	250
第四节	从南方传入的佛教	256
第五节	大佛之乡	259
第六节	佛教胜地峨眉山	267
第七节	基督教入蜀三百年	269
第八章	民俗	276
第一节	川味饮食名满天下	278
第二节	茶饮之乡	293
第三节	游乐之盛	297
第四节	遍布城乡的袍哥	303
第九章	交流	319
第一节	蜀道难与蜀道通	319
第二节	通向南方之路	334
第三节	兼容与辐射	342
第四节	湖广填四川	350
代结束语:巴蜀文化尚待探索的若干问题		358
参考文献		361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释“巴”、“蜀”

四川地区古称巴、蜀，最早是巴、蜀分称，以后则巴蜀合称。然而无论是巴或蜀，在古文献中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① 不过，无论是殷周的甲骨文还是金文中，都未见到巴的记载。这可能是一个偶然现象。有一些学者认为甲骨文中有“巴方”、“巴甸”，地域就在今汉水、丹江之间，殷武丁时期就曾与殷王朝发生过较大的战斗^②。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迄今为止，甲骨、金文都未见巴字，现在部分学者所释定的“巴”字乃是误解。这一古文字的考释问题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讨论，我只想指出，在学术界具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几部古文字学巨著，如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和《汉语大字典》，都不认为

① 引自郭沫若 1960 年 2 月参观重庆博物馆巴蜀文化陈列后所提诗句。

②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论述见董其祥：《甲骨文中的巴与蜀》，载《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版；段渝：《四川通史》第 1 册第五章第二节《巴方史迹》，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甲骨文中有巴字。

巴字在古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山海经》，而且是以地名与国名出现，如“西南有巴国，……后照是始为巴人”，“是司神于巴”，“巴蛇食象”。这以后，则见于《逸周书》、《世本》与《左传》。最初的巴，应是一个古老民族之名，其活动范围包括今川东、川北、陕南、鄂西乃至洞庭湖一带的广大地区，而鄂西应是其中心。在这个广大地区内的民族应当是有支系、有迁徙的，也并不来自一个族源，但巴族是其主体族，故而相关各支系都曾被称之为巴人。这其中，有的与周族关系密切，姬姓，即宗姬之巴；有的是属于南方的濮人系统，即后世称为廩君蛮的廩君之巴；有的是属于夏人后裔，即丹山之巴；有的是属于太皞之后，即后照之巴；有的是活动在今川东地区、后世称作板楯蛮的賸人之巴。所有这些在巴地生息繁衍的人们，被后世统统称之为巴人，他们所活动的地区也都可以称之为巴，于是“巴”也就由民族名演变为地域名。

殷末周初，巴人参与了伐纣之役，“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华阳国志·巴志》），于是巴族的一部分从此姓姬。巴地最早与中原有联系的诸侯国可能就是在这时建立的，这就是古文献中所称的巴国或巴子国，也就是巴地诸族的核心。公元前703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杀道朔及巴行人，……邓师大败”（《左传·桓公九年》）。这是巴作为一个诸侯王的军事、外交活动首次见于文献记载。这以后，巴与楚联合灭申、灭庸，显示了强大的实力。《左传·昭公九年》载：“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巴被列于周王朝的南方诸侯之首，用后来荀子的话说，属于“天下之显诸侯”之列（见《荀子·儒效》）。不过，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巴国，主要活动范围都在汉水流域，不在今四川境内。春秋末年，由于巴、楚联盟破裂，兵戎相见，“数相攻伐”。在“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华阳国志·

巴志》)的情况下,巴国的统治中心逐步向南转移,先至鄂西南的清江流域,然后沿清江西上进入川东,到战国初年,其统治中心已在川东,而且不断迁徙,“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华阳国志·巴志》)。直至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俘巴王,巴国亡。这段时间,“巴”主要是作为国名。

秦灭巴国之后,在巴国原地设置巴郡,治江州(今重庆)。巴郡之设,汉、晋因之。这以后,东汉还设置了巴东郡(治今奉节)、巴西郡(治今阆中),东晋在巴西郡(治今南部)之外又设置了北巴西郡(治今阆中)、新巴郡(治今江油),刘宋设置了巴渠郡(治今达县),齐设置了巴州(治今奉节),梁又设置了东巴州(治今南江)、宁巴郡(治今宣汉东林)、巴中郡(治今开江)、开巴郡(治今宣汉普光),北周设置了巴县(治今重庆)、三巴郡(治今宣汉普光),唐代设置了巴川郡(治今合川)。直到清代,重庆市中区仍称为巴县。所有这些行政区划之设置,充分表明了“巴”作为一个地名在古代巴国范围内使用之广。正由于“巴”作为地名的普遍使用,当唐代在今川东地区不再设巴郡之后,人们仍习惯于将川东地区称为巴。到了现代,虽然原来巴地仅保存了一个巴中县的行政区划,人们仍习惯于将川东地区称巴。所以,在近代,巴就从过去的行政区划之称,转化为普遍使用的代称。

蜀字不仅见于殷墟甲骨文,也见于周原甲骨文。当时蜀已是一个方国的名称,或一片地域之称。在这个地域之中,其主体民族是蜀族,这个方国或地域被殷人称之为蜀,当然也是源于蜀族。蜀族本身也是一个多源的复合型民族,但从整体上来看,蜀族的族系与分布较之巴族要单纯而明晰得多。蜀族本是氏羌族的一支,早期活动地区在岷江上游山谷之中,逐渐发展到成都平原与陕南,长期以成都平原为根据地。在今川西至陕南的广大地区之中的古老民族,则都被称为蜀人或蜀族。

川西的蜀族很早就进入了文明的大门，建立了古老的国家，有了蜀王。古蜀王国的历史轮廓，幸赖有扬雄的《蜀王本纪》一书作了简略的描述：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凡四千岁。

这个记载对古蜀王国经济文化的总的估计是不确的，与实际相比明显偏低。但对几代蜀王的记载，应当是有根据的。蚕丛氏主要活动在岷山山地，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境即汉代的蚕陵县，“蚕陵，即古蚕丛氏之国也”（见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引唐代卢求《成都记》）。而鱼凫的活动中心则已移至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遗址很可能就是当时的都城。蒲泽又作蒲卑，即杜宇氏，都于郫邑，很可能在今郫县北边的杜鹃城。开明氏在开明九世时从樊乡（今彭州、新繁境内）徙都成都，时间大约在距今 2500 年以前。

开明氏晚期，北边的秦国已迈开了统一天下的步伐。按照“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的战略，秦并天下自蜀始。公元前 316 年，秦军南下，本年之中，先灭成都之蜀，再取江州（今重庆）之巴。巴国与蜀国不复存在。在巴蜀旧地建立了巴郡与蜀郡。蜀郡的设置，从秦代一直沿袭到唐代。唐代以后，蜀不再是行政区划之名，但川西乃至整个四川地区长期以蜀或蜀中作为代称。直到清末，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被推翻之后，重庆所成立的新政权仍叫“蜀军政府”。

综上所述，无论是巴与蜀，其概念的内涵都有一个由族名——地域名——国名——行政区划名——地域名的变化过程。今天则用作四川地区的代称。

我们说巴蜀是四川地区的代称，这只能是一种大略的提法，严格来讲是不够准确的，因为：（1）四川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划，从古至今，是在不断变动的；（2）今天四川省西部甘孜州的高原地区，习惯上都不

视为蜀中的一部分。古代的巴蜀地区,大致来讲,主要就是指四川盆地。在元代以前,还长期包括陕南的汉中地区。从考古学资料可知,早在殷周时期,汉中地区就与古蜀文化密不可分,极可能是古蜀王国的一部分,后来秦与蜀曾反复争夺汉中。秦末刘邦为汉王时,所统治地区也是“王巴、蜀、汉中”(《史记·高祖本纪》)。故而当时人视蜀汉为同一地域,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卷蜀汉,定三秦。”更重要的是从文化上观察,是“与巴蜀同俗”(《汉书·地理志》)。故而当时将汉水两岸也称为蜀,如秦王迁吕不韦于房陵(今湖北房县),叫作“迁蜀”;刘邦封汉王,都南郑,韩信则说他“失职于蜀”。西汉时,汉中郡划属益州。这种格局,东汉、三国、西晋、唐、宋一直沿袭,直到元代,汉中地区才不再是四川行省的一部分而划归陕西行省。除汉中地区之外,在元代以前,今云南、贵州两省的北部与甘肃的南部,也曾长期与四川盆地同属一个行政区,但历代变化各异,古代这些地区又多是少数民族居住区,故而习惯上不把这些地区视作古代巴蜀的一部分。

川东称巴,川西称蜀,这也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其实,古代的巴还包括今天被称为川北的四川盆地北部的大部分。关于汉以前的巴蜀分界,文献上并无清楚的记载,蒙文通老师经研究后指出,巴与蜀之间,大致以涪江为界,而在个别地区各占东西^①。今天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基本上均从蒙文通之说。

在讨论古代的巴与蜀的有关问题时,巴与蜀得名的由来,即“巴”与“蜀”的本来含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必须注意到的,四川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较为活跃。单是“巴”的本来含义,就有水名说、山名说、植物名说、动物名说、居处说、雄性崇拜说多种,动物名说中又有象蛇说、鱼名说,居处说中又有起于平坝说与起于石穴说两种,众

^①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巴蜀史的问题》第三节《巴蜀分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